

当真相可有可无：政治传播中“空说空转”现象的批判性分析

苏 颖¹ 汪燕妮²

【内容摘要】 不同于谎言对真相的敌视或误导对真相的操纵，政治传播中“空说空转”的本质是对真相的漠视，其形式是空洞的公共表达与社会互动，其结果是政治言说虽在公共交往中流动，却失去事实验证的支撑，最终导致公共讨论的持续空转。“空说空转”是一个社会性过程，其政治传播结构包括不关心真相的主体、空洞无物的内容、不计较真假的受众以及难以测量的仪式性效果。政治传播中的“空说空转”可概括为四种类型：施行空说，即以言行事的空头承诺；模糊空说，即以虚代实的象征膨胀；形式空说，即知行分离的无责漫谈；数据空说，即以实证虚的科学伪装。“空说空转”凸现代理性规范在当前政治传播中的实践困境。在这一时代症候下，以事实为底线，以本真为方向，或成为政治传播需要考量的规范起点。

【关键词】 政治传播 空说空转 后真相 虚假话语 “扯淡”

【作者】 1 苏 颖，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2 汪燕妮，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北京 1000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政党制度视域下的比较政治传播研究”（20CZZ005）

导言：一个公共言说“空说空转”的时代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政治传播呈现突破常识的新趋势：真相在退场，荒诞却在蔓延。^①一些西方重要政治人物在公共言说时东拉西扯、不知所云，其信息轰炸的强度前所未有，而事实核查的比率却极低。^②推特平台多次将他们发布的内容添加事实核查警告标签。这种史无前例、不着边际、前后矛盾、无法证实的言语模式，令新闻机构与事实核查组织颇为困惑。^③如此多重要



政治人物肆无忌惮地信口胡诌，着实让学界与业界相当不安。^④

美国哲学家哈里·G. 法兰克福（Harry G. Frankfurt）在《时代周刊》发表专栏评论，直指这类政治言说为“扯淡”（bullshit）。^⑤更值得省思的是，这种公共言说形态并非由政治人物单向度地施加于民众，民众也在积极助推其传播与内容再生产。相关研究发现，被标注为“虚假”的推文反而比未标注的推文传播得更广、持续时间更长。^⑥而且，诸多研究显示，“虚假新闻”的自动化传播助推了相关候选人的胜选。^⑦法兰克福颇为忧心指出，政治人物的频繁扯淡虽然令人不安，但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居然如此热情地接受这类不诚实的人。^⑧还有一部分民众热情地消解这一类型的新政治。比如互联网上大量流传的对政治人物的调侃、恶搞、表情包与讽刺。这种表达方式将政治从严肃中剥离开来，转化为一种高度娱乐化的情绪发泄，这类行为可谓“用扯淡对抗扯淡”。有研究指出，在后真相时代，“扯淡”表现为对既有公共知识判准及其所依托的专家权威的漠视或反抗。^⑨

由此，一个广泛存在且反映时代特征的现象逐渐浮现：一种漠视真相、内容空洞却广泛流通的公共言说，正在成为当下政治传播中的重要实践形态。法兰克福使用“扯淡”这一看似粗鄙的概念来定义这种现象。^⑩他指出，“扯淡”是“认为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没有差别的态度”，^⑪这类言说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仅仅只是“吐出热气”（hot air）。^⑫就其社会影响而言，法兰克福进一步指出，“扯淡”已经成了“我们的文化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⑬然而，这类现象不仅仅关涉个体层面的言说态度，当人们对事实真相的漠视，经由媒介系统反复生产、广泛传播，并持续产生政治效果时，它已无法被限定为语言哲学问题，而是在传播学意义上转化为一种新的符号操纵方式，构成“新宣传”策略的历史延伸。^⑭

本文在法兰克福“扯淡”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将这一研究引入政治传播领域，并以“空说空转”（discursive idling）这一概念，对当代政治传播中的相关现象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在新的传播生态与后真相政治的时代背景中，公共言说的去真相化“空说”和仪式化“空转”不再是边缘现象，而是正在进入主流文化范畴，成为无法忽视的、影响民主政治沟通与公共理性的“扰动”因素。然而，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的时代症候，“空说空转”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们愿意接受甚至积极参与其中？或者说，这一广泛存在的大众现象，对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于以上问题，我们有必要给予严肃回应。本文试图为这一时代新现象提供可能的理论解释，并且启发人们思考：在一个似乎无可避免的“真相濒死”的时代，我们还能否为政治传播重建某种有限的规范边界？

政治传播中“空说空转”的概念建构

“空说空转”并不追问传统哲学分析对象，如知识（knowledge）或信念（belief）意义上的“有”，甚至并非言说“缺失”的“无”，如“沉默”，^⑮而是明明在言说，却无任何指向，亦不生成任何意义的“无”。因此，本文将其概括为“空”，是一种不知所谓的言说状态在公共空间中的循环往复。“空说空转”与政治传播中的虚假话语现象密切相关，但又无法简单等同。需要指出的是，政治传播中的“虚假”并非单一类型，而是多样且层次复杂的。^⑯事实上，某些虚假信息往往是结构性的、难以彻底克服的。以假新闻（fake news）为例，它在实际传播中往往并非完全出于有意造假，而可能是由于媒体难以避免的偏见、审查疏漏或采编机制导致事实失真。^⑰因此，假新

闻更多地反映了媒体在操作层面对真相把关的局限性，而不是政治操纵。然而，本文关注的重点并非此类因失察而产生的不可避免虚假，而是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现象的“空说空转”。

（一）“空说空转”不是什么？

在厘清“空说空转”之前，有必要将其与其他虚假话语加以区分。

其一，“空说空转”与谎言（黑色宣传）的区别。撒谎是政治传播实践中久远且常见的现象。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真理与政治》一文的开篇直指：“谎言从来都被认为不仅是政治家或煽动家的必要、合法工具，而且也是政客交易的工具。”^⑧可见，谎言被视为政治实践的一部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谎言虽是政治现实中难以克服的存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具备政治上的正当性。政治传播中的撒谎行为，被形象地称为“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黑色”意味着不正当，“宣传”在此被污名化为伪造事实、欺骗民众。纳粹德国的希特勒与戈培尔的宣传是典型案例。而且，相较于小谎，希特勒更喜欢大谎，因为在他看来，谎言越大就越难被驳倒，例如，犹太人如何才能证明自己并未参与一场巨大的阴谋呢？^⑨谎言尤其可能出现在战时宣传中。典型案例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婴儿保育箱事件”：科威特女护士在美国国会作证称，伊拉克士兵将婴儿从保育箱中取出扔到地上致死，激起全球舆论愤怒，但事后证实该证词完全是伪造的政治公关操作。^⑩

谎言显然是虚假，但是与“空说空转”存在本质区别。从言说视角来看，撒谎行为至少包含三个要件：（1）说话者陈述了某一命题；（2）说话者明知该命题为假；（3）说话者将自身置于一种提供担保的对话语境中。^⑪其中，第二个要件是指说话者清楚地知道或有充分理由相信该陈述不真实，清晰定义了撒谎的虚假性质。但是，空说与撒谎的关键区别在于第三个要件，撒谎是说话者在一个要求对真实性负责的对话语境中发言，即承诺与真相之间存在可核查的关系。说谎者并不是随便胡说，而是在一个承诺自己与真相有某种关系的情境中讲话。他假装自己说的是真的，给听众一种他是可信的、值得信任的印象。换句话说，说谎的人实际上必须默认“真相”这个标准存在，并试图与它“对抗”。比如，一个政治人物公开在记者会上说“我们绝不会加税”，他其实知道会加税，但他是在一个“公众相信他在陈述事实”的语境里发言的。他知道真相，也知道自己背离了它，但他用谎言来替换真相。

总之，撒谎是在一个人们都默认“说的‘应该’是真的”的对话空间里，故意用假的替代真的。这是一种有明确目的的行为，是在受众的信念系统的某一点上塞入一个虚假的命题，从而避免该点被真相占据的后果。因此，撒谎的核心逻辑是，它是对真相的敌视，但也依赖真相作为参照。与“空说空转”不同，撒谎是一种对真相有敌意却不得不承认真相存在的言说行为。它一旦被识破，虚假性会引发强烈的正当性危机，传播者须承担巨大的舆论和政治风险。正如“婴儿保育箱事件”后来真相大白，美国政府和军方不得不面对全球舆论质疑，现实公信力受损，其谎言亦被政治传播学史记载为一桩不正当宣传的典型案例。

其二，“空说空转”与误导（灰色宣传）的区别。基于谎言的政治传播没有任何正当性基础。为了解决这类政治传播的正当性困境，在政治传播实践中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即“灰色宣传”（Grey Propaganda）。与黑色宣传不同，灰色宣传并非完全捏造事实，而是利用部分真实信息增强其可信度。^⑫因此，灰色宣传的方式不是撒谎，其核心关键词是“误导”。误导是某人为了将对方引向错误的方向，说一些严格来说是真实的事情但同时传达一些虚假的事情。^⑬误导者不一定直接撒谎，而是通过选取性叙事、信息遮蔽、前后剪裁等手段，诱导受众得出与事实相悖的结论。



亦即，谎言在内容是虚假，而误导在内容上可真可假或真假参半；谎言的手段是欺骗，而误导的手段是操纵。

显然，空说也不完全等同于误导。因为与谎言类似的是，操纵同样以真相为参照点，只不过比赤裸的谎言更具隐蔽性。误导的典型案例是2002—2003年围绕英国政府发布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报告所引发的真实性争议。英国政府在报告中强调萨达姆政权可能拥有可在短时间内部署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指出，政府在报告措辞上存在“夸大”（sexed up）的情形。相关争议最终进入司法调查程序，并在英国政坛引发持续动荡。^④在这一案例中，问题并不在于情报是否完全虚构，而在于信息的选择、语气的强调以及不确定性判断在传播过程中被如何呈现。部分情报内容本身具有事实基础，但在公开传播时通过突出最具威胁性的解释，弱化条件性与不确定性，从而在公众舆论中引导有关战争紧迫性与正当性的认知。这种做法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撒谎，因为它并不违背字面事实，但危险之处在于，它通过对真实信息的策略性操纵，引导公众判断出现方向上的实质性偏移。有学者强调，误导在手段上非常狡猾，在道德上甚至比撒谎更为恶劣。^⑤

（二）“空说空转”是什么？

与谎言或误导相比，“空说空转”呈现出一种更极端、也更具破坏性的特性：它既非有意制造虚假信息，也非刻意操纵公众认知，而是根本不把真实性视为必要条件。在概念上，“空说空转”首先表现为一种作为公开表达与社会互动而存在的“空说”状态。从形式看，我们可将这种“空说”界定为：说话者在未加核实或根本不关心所言是否真实的前提下，出于自我表达、身份表演或情绪动员等目的，随意生成并公开传播的言说行为。

与谎言依赖事实作为背离对象、误导依赖事实作为操纵工具不同，空说不仅仅只是真假参半、真假混杂，而是完全空洞化，既无可证伪性，也缺乏可核查性。与谎言和误导不同，空说不是敌视真相或操纵真相。正如法兰克福深刻指出的，从本质来看，它是“对真相的漠视”。^⑥空说的言说者放弃对真相的追问，并通过无可验证的、含混的或冗余的表述，填充公共讨论的空间，稀释人们对“真假之别”的敏感性和“对正确与错误之区分的尊重”。^⑦

自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6年以来，不知所云的空说现象在全球政治传播中泛滥。以2024年美国大选为例，10月25日，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举办的市政厅选举节目时，被问及作为总统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以确保美国纳税人资金不会被用于支持导致巴勒斯坦平民死亡的轰炸，她的回答是：“我会这么说，也是回答你的问题。有太多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被杀，这是不可接受的。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在辛瓦尔（哈马斯领袖）死之后，我认为我们确实有机会结束这场战争，带回人质，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救助，朝两国解决方案努力，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同等的安全，巴勒斯坦人民得到他们应有的尊严、自主权和安全。”^⑧

这段回应是空说的典型体现：在形式上，未提供任何可验证的具体行动或政策路径，而是用空洞的愿景、模糊的承诺和价值判断填充提问者期待的事实回复；在本质上，这种表述既非有意撒谎，也非刻意误导，而是根本无意承诺任何可验证的真相。例如其中的“转折点”“机会”等词汇缺乏具体可验证的指涉，“两国方案”的落实路径也未曾提及。由于这类言论不主张任何有效性，因此也不能根据常规的批评标准而被追究责任。^⑨法学界对包括司法干预在内的政府抑制竞选虚假言论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尽管有大量法规尝试限制虚假陈述，但法院实际上很难界定何为可验证的谎言，

也很难让政府充当“真相的仲裁者”，大量毫无责任感的公然空谈也因此逃避了司法追责。^⑳

从后果来看，“空说”是对政治传播根本规范的破坏，直接造成了公共言说的“空转”。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Wilbur Schramm）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与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没有共同体；同样，没有共同体，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㉑换言之，传播不仅是信息流动，更是生成社会公共性的制度条件。荆学民进一步指出，政治与传播在本体论上是同一的，“传播即政治，政治即传播”，因为传播、政治在本质上都是“公共”的。^㉒要维系公共性，传播必须以真实为前提，且转化为共同知晓、共同讨论的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其逻辑链式是：（1）所有人都知道；（2）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3）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依此类推。借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来解释，传播的有效性取决于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三个维度。^㉓若真实性丧失，理性讨论就无从谈起。因此，真实是传播存在之意义的基石，“追求真相”成为传播实践即新闻业的基本规范。^㉔真实之于传播，如同资本之于市场、权力之于政治。

然而，“空说空转”的公共言说形态恰恰破坏了这一基石：（1）它让公民无法获得准确信息，削弱其认知与判断力；^㉕（2）它让政治传播偏向情绪煽动和话题炒作，削弱信息的实质性；^㉖（3）它通过情绪动员稀释理性讨论能力，使公众放弃对真相的追问。^㉗空转的言说，即空洞、含混或自相矛盾的言辞填充公共话语空间，使讨论失去事实焦点，最终稀释了公共领域中可共同讨论的理性前提。正常的公共知识链条被空转的言说打断：空说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或不知道）”，而是“所有人都不在乎知道或不知道”。因此，从效应看，可以将“空说”定义为一种“空转”的言说，即空说是一种破坏公共知识生成的表达方式，表现为用无关、空洞或含混的语辞填充公共话语空间，使共同体无法围绕事实建立共识，进而造成言说空转的公共后果。

换句话说，空说在实质上是对传播共同体内部可共享性、可验证性、可对质性这些核心规范的消解。它既可能是恶意的（如故意用空话转移焦点），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如因理性能力不足而信口开河），但共同点在于，它对信息的可验证性与对话的责任毫无兴趣。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破坏哈贝马斯意义上交往理性的真实性，而且连带侵蚀正当性与真诚性，可谓对现代理性精神的根本瓦解。

从概念区分来看，撒谎是对真相的敌视，误导是对真相的操纵，而空说是对真相的漠视。“空说空转”的危害性并不止于内容不实，而在于它搅浑了人们对何为真实、何为讨论本身应遵循之规范的预期。当“空说空转”成为习惯，公众便失去了对真相的追问冲动，丧失了进行有意义的公共讨论的能力，只留下话语的表演与意义的空虚。

表 1 撒谎、误导与空说的比较

类型	与真相的关系	人为意图	可验证性	典型后果
谎言	敌视真相	有意制造虚假	高	以假乱真，欺骗
误导	操纵真相	有意引导误读	中	遮蔽事实，误导判断
空说	漠视真相	无意理会真假	低	空话填充，稀释共识

总之，“空说空转”指一种政治传播的病理形态：政治言说在形式上作为公开表达与社会互

动而持续存在，却在过程中系统性地漠视事实、证据与真实性责任，从而呈现为一种空洞化的空说；其结果是，政治言说虽然在公共交往中广泛流通，却无法转化为可共享、可验证的公共知识，公共讨论因失去事实支撑而陷入持续空转。

“空说空转”的政治传播结构

“空说空转”不仅是一种言说态度，更是一种可被分析的传播结构。突破法兰克福的哲学式讨论，若将其放入政治传播视野中，便可发现：与撒谎或误导不同，“空说空转”并不依赖单一主体的蓄意策划，而是由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及其所产生的作用效果四个环节共同构成的社会性过程。

（一）不关心真相的主体

“空说空转”之所以存在，根源在于言说主体对真实性的根本漠视。法兰克福在《论扯淡》中通过一个著名的例子揭示了其中要义：帕斯卡身体不适，维特根斯坦前来探望时，帕斯卡抱怨道：“我感觉自己像被车碾过的狗。”维特根斯坦严肃反驳：“你根本不知道一只被车碾过的狗是什么感觉。”在法兰克福看来，维特根斯坦的反感并非针对比喻本身，而是针对帕斯卡所体现的态度：她说了一件事情，但她根本没打算说对，只在乎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帕斯卡既不可能知道、也完全没考虑过被车碾过的狗是什么感受，她甚至连自己怎么会知道这种感受也没想过。这种表述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令人反感，因为其缺乏对事实的在乎和关切。

在政治传播领域，这种态度表现为言说主体不以真实性作为公共表达的基本前提，甚至在表达中弱化真假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美国的“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争议是其典型案例。2017年，时任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宣称特朗普就职典礼吸引了“史上最多”的观礼人群。媒体根据航拍图像、华盛顿地铁客流数据进行核查，指出官方说法与可验证资料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时任总统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斯派塞辩护，称“我们的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给出了‘另类事实’”。^⑧此后，康威在其他采访中进一步解释这一说法：“二加二等于四。三加一等于四。局部多云，部分晴朗。杯子半满，杯子半空。这些都是另类事实。”^⑨这一表述引起广泛舆论争议与行业内批评，其作为一种公共表达明显失当、失范。因为这一说辞置换了“事实”的内涵，即以“另一种事实版本”替代“事实是否成立”的判断，由此，“是否承认某一事实”的责任被转移为不同立场之间的叙事差异，而非基于证据裁定的真假判断。

（二）空洞无物的内容

法兰克福强调，扯淡是对真相的漠视。科恩（G. A. Cohen）批评法兰克福的分析过于聚焦扯淡者而忽视扯淡本身。他指出，有些话语并非出于对真相的漠视，而是客观上无法清晰表达。这在学术语境中颇为常见：本可用几句话表达清楚的论点，却用大段冗词堆砌成晦涩难懂的行文。此时，言说者未必自觉在空说，却制造了客观意义上的空话。科恩据此提出，“作为过程的扯淡”强调动机层面的漠视真相，而“作为结果的扯淡”则关注语义层面是否存在“不可澄清的模糊性”。^⑩

在政治传播中，这种空话尤为常见，典型如套话、官样文章或冗长陈词。2024年10月25日，哈里斯参加前述所提及的选举节目时，在所有与主持人或现场观众的互动中，未曾正面回答任何

问题。比如主持人问：“在以色列问题上你会比在特朗普问题上更强硬吗？”她回答了整整七分钟，但内容却与问题毫无关联。^④美国民众认为，哈里斯爱讲空话套话、避重就轻、回避问题、顾左右而言他，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称她的言论“空话连篇”（word salad）。

（三）不计较内容真假的受众

“空说空转”最耐人寻味的是受众的反应。“空说空转”之所以成立，还因其依赖一种特殊的受众结构：观众对此的宽容甚至默认。康素鲁·普莱迪（Consuelo Preti）指出，法兰克福和科恩都忽视了“扯淡观众”这一关键环节。^⑤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热情接受的民众，扯淡塑造了一种新的受众：“当我们面对我们认为是荒唐的、不相关的或者不明的事情时，我们通常称之为扯淡。我们因而会有意忽略宣讲人——拒绝认真对待他的言论。”^⑥

面对荒谬、空洞或自相矛盾的言辞，民众往往出于无力感、冷漠、娱乐化或自我保护而放弃追问。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描述，“认真你就输了”正是空转的传播情境中一种广泛存在的受众心理状态。阿兰·理查德森（Alan Richardson）指出，有一些扯淡是供人们娱乐或者消磨时间之用的闲谈，^⑦人们并不指望其传达真实信息，因此无须对其认真。斯科特·肯布罗（Scott Kimbrough）进一步指出，这种“可容忍的扯淡”背后是人们为了礼仪、娱乐或权力附和所做的妥协。当空说成为一种语言权力时，就像奥威尔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随声附和空说就是附和权力。于是，很多时候人们干脆选择“左耳进右耳出”，既不相信，也不反驳，而是让其“顺滑地滑过去（听其自然）”（letting it slide）。^⑧

（四）难以测量的仪式性效果

“空说空转”并不等同于有意达成某种确切的说服效果，相反，它往往只要在表面上填充了言说空间就达成了目标。因此，它的效果难以量化，且难以描述。人们对“空说空转”的容忍往往高于对谎言的宽容，一方面是因为它常带有社交润滑、礼仪妥协或娱乐调剂的功能，人们对它的失真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它接近戏剧仪式：说话者未必相信自己在说什么，听话者也未必相信说话者，彼此都心知肚明，却依旧共同维系这场基于表演性和场面维系的“言说仪式”。

借助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和互动仪式视角解释，“空说空转”可以被看作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社会戏剧”。一方面，“空说空转”作为一种开放型话语本身就是艺术和表演的策略，而个体会按照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现自己，其目的纯粹是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⑨另一方面，个体自己只能描绘自我形象的一部分，需要依赖他人通过对他的尊重和态度来补全这个整体的自我形象。因此社会仪式便出现了：个体之间通过一种“仪式链”来互动，每个人以适当的态度和举止尊重邻近的人（如与其他人一起“空说空转”），形成了一种社会认可的链条，使得每个人的自我形象得以完整展现。^⑩

当个体受众在群体注视下选择“听其自然”时，其反应本身已成为维系互动秩序的仪式性表演。进一步来看，当受众以这种姿态接纳“空说空转”时，政治传播过程本身就不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转向一种“象征性展演”的社会仪式。正如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所指出的，传播的仪式观关注的不是信息在空间中的传播扩展，而是社会在时间中的维系；不是传递信息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表达。^⑪然而，在另一些语境中，尤其是政治传播本应履行信息传递与公共沟通功能时，传播者依然选择空转的言说，则受众的接受就不再具有积极的仪式功能。正如肯布罗所言，此时的沉默或顺从，是基于权力关系的表演性配合。其表面上延续了传播的仪式性，



实则是一种利益的合谋。但无论是哪种情况，“空说空转”使得受众和传播者在“人生如戏”的戏谑又犬儒的态度中一起扮演自己的角色，按照自己的社会剧本完成社会仪式。^④

政治传播中“空说空转”的类型

尽管“空说空转”在理论上强调言说主体对真相的漠视，但在现实政治传播中，公众甚至是专业媒体、司法人士都难以判断何谓“漠视真相”的“空说空转”。本文尝试立足于可观察的政治传播实践，分析何以识别此类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空说空转”的类型学。

（一）施行空说：以言行事的空头承诺

施行空说聚焦于一种典型现象：政治传播主体以无法兑现或无意兑现的承诺填充言说空间，用言语的“施行性”替代实际行动。这一类型的空转可以在奥斯汀（J. L. Austin）的“言语行为”概念中寻找理论解释。奥斯汀在其经典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中打破了传统的语言观：传统观点认为，语言的使用本质上是陈述事实或描述事态；而奥斯汀则指出，语言不仅具有陈述的功能，还具有施行（performative）功能，即言语行为。当“说话就是做事”时，这类话语就被称为施行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⑤奥斯汀认为，施行话语的首要功用是“做事”，而非陈述事实或描述事态。因此，这类话语无真假之分，因为它们的意义不在于传达信息，而在于通过语言本身完成某种行为或产生某种效果。在施行话语的基础上，理查德森提出了“施行扯淡”（performative bullshit）的概念，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扯淡，它的典型特征是：一个承诺仅仅因为被做出了，那么就意味着已经得到履行，^⑥而是否真的兑现则被刻意悬置。更有甚者，当公众质疑时，言说者会把原本未履行的承诺当作履行本身的证据，借此阻断追责。

在现实中，这种施行空说及其造成的空转后果尤为典型，最常见的就是竞选政治中无法兑现的政治承诺：“如果我当选，我将……”例如，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支持脱欧的“投票脱欧”阵营（Vote Leave）将英国每周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作为宣传重点，并承诺如果脱欧，这笔钱将用于资助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这一言论出现在各类广告、演讲和竞选材料中，成为脱欧运动的重要支撑。然而，脱欧成功后，这一承诺就随着选民重要性的降低而消散了。美国更是如此，相关数据显示，从威尔逊到拜登以来的美国总统承诺实现率仅为67%，近三任总统任期内更是逐期下降，最低降至57%。例如，特朗普在两次竞选时曾作出的承诺有近一半未实现。^⑦

施行空说与法兰克福所说的“漠视真相”一脉相承，都是内容真假退居其次，但其重点在于言说本身取代了行动，它揭示的实质是言说与行动之间的虚假关联。在政治传播中，它以看似郑重的承诺形式出现，成为非常具有迷惑性的“空说空转”类型之一。

（二）模糊空说：以虚代实的象征膨胀

模糊空说指的是政治传播主体利用语言的模糊性与多义性，通过抽象口号或宏大叙事来整合分散、冲突的利益诉求。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舆论》中指出，文字本身充满了模糊与歧义，读者往往依赖自身习惯去理解词语，因此语言天然被用来传递模糊、可被各取所需的符号信息。他还提醒我们，许多词汇会随着时间的使用而逐渐偏离原意，甚至被用来表达与最初意义毫不相干的概念。^⑧这种现象在政治传播中尤为典型：政治人物常利用语言的模糊性构建宏大叙事，用含混的符号制造表面一致的支持。在政治语境下，这种模糊性通常通过“象征膨胀”（symbolic

inflation)^⑤表现出来：政治人物用模糊的口号和符号包容多样化诉求，以最大公约数式的意义整合存在分歧的选民。正如李普曼所说：“和谐统一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由各种象征符号组成的等级体系。”^⑥

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这一竞选口号就是典型的“象征膨胀”式制造模糊的“空说空转”类型。制造业工人将MAGA理解为恢复就业机会，保守派看到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反对移民者则联想到排外立场。^⑦同一句话，不同群体可以自我填充意义，从而形成表面统一的情感动员。而且，候选人在传播中有意强化了这种模糊性。他不断重复简化的情绪化表达，如“美国正在失败”“华盛顿政客毁了国家”，却很少提供具体政策方案。他通过社交媒体、集会演讲，将MAGA塑造成超越竞选口号的政治品牌，甚至催生了持续性的“MAGA运动”，以模糊的象征维系分化的支持者群体，消解了对事实和细节的追问。“象征膨胀”并非特朗普独创，里根在1980年就用过类似口号，哈里斯的言谈充斥着“正确的废话”，亦深谙模糊空谈之术。

(三) 形式空说：知行分离的无责漫谈

形式空说指的是言说与行动的割裂，表现为形式主义表达伴随的主体责任消解。这类言说往往在行政层级的转述和搬运过程中失去原有的行动指向，演变为一种以程序合规为导向、在制度互动中不断弱化行动责任的“无责漫谈”。^⑧

形式空说在现实中多表现为制度化表达与执行实践之间的脱节，即政策文件、战略文本或规范性表述在不同层级之间不断被引用、转述与复制，形成高度一致的语言体系，但这种表达主要服务于留痕或绩效要求，导致的结果是政策语言不断生产，并趋于高度规范，然而行动责任却在层级转述中被持续稀释，最终呈现出责任主体的空心化状态。这一类型的空说，可在迈克尔·鲍尔(Michael Power)关于“审计社会”的研究中得到理论启发。鲍尔指出，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与制度化问责压力之下，组织审计不断扩展，并呈现方案性与技术性两种实践类型：前者指目标、理想与规范的宏观设计，后者指具体操作程序与文档记录的实施。在此种安排下，组织通过不断生产可审计的文本与记录，形成一种表演性实践，用以表现治理的合规性。^⑨

在英国地方治理实践中，基于上级审计、政府绩效等压力，地方官僚通过报告、绩效文件和标准化文本证明政策执行状态。然而，在这种治理沟通实践中，官员的注意力着重于形式性文本，而非实质回应政策目标与公众需求。这种类型的空说，既不同于以言说替代行动的施行空说，因为行为主体并未作出难以兑现的承诺；也不同于依靠含混修辞的象征膨胀，因为其表达并不依赖语义模糊。相反，形式空说呈现为一种颇具程序正当性的治理方式，但它仅仅形成治理中的合规姿态，而并不必然反映或转化为实际的政策行动结果。

总之，形式空说的根源在于知行分离，即表达的形式凌驾于治理的实质之上，其动机并非落实，而是向上级或体制本身转嫁责任风险。形式空说在现实中表现为制度目标的文件化、表格化，其结果是在不断的制度化交往中分散主体责任，从而造成治理实践的空转后果。

(四) 数据空说：以实证虚的科学伪装

数据空说是近年来在数据化、量化崇拜背景下出现的“新派”空说类型，其核心是用看似严密的统计数据 and 图表为虚假或空洞话语增添科学性与可信度。

卡尔·伯格斯特龙(Carl Bergstrom)和杰文·韦斯特(Jevin West)在《拆穿数据胡扯》中指出，今日科技信息化高度发达，数据与图表往往比辞藻更实用，可让“胡扯”如虎添翼。数据空说之所以有效，根源在于“数学崇拜”。现代科学将数字视为最精确可靠的语言，不仅用于描述自然

现象，还是验证科学规律的核心工具。数据化使科学研究具备可预测性和普适性，从而被赋予更高权威，数据主导了科学的研究范式，成为衡量科学性的重要标准。许多受众面对数据化信息时，往往忽视数据的来源、筛选方式或图表背后的逻辑，仅凭“量化”二字便放弃质疑。伯格斯特龙和韦斯特指出：“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学生被训练去碰撞冲突观点，与不一致的观点斗争；而在 STEM 领域（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生调和矛盾证据、批判错误论断的机会却很少。”^⑧这一漏洞被数据空说者利用，以似是而非的数据包装无根无据之言。

以时任美国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为例，沃克在 2011 年 6 月宣称全美 50% 的就业增长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各州的就业增长呈现明显的分化趋势：部分州的就业岗位总体减少，而另一些州则有所增加。正增长与负增长几乎达到了平衡，净变化仅为 1.8 万个就业岗位。尽管威斯康星州净增了 9500 个工作岗位，占全美净增长的近一半，但这完全不能说明全美新增就业岗位大部分集中于该州。这种以片面数据支撑全貌结论的做法，正是披着数据外衣伪装事实的典型表现。

可见，数据空说是利用数据“赋能”胡诌，用似是而非的数字和图表为缺乏依据的言说镀上一层“科学”的外衣，体现了一种数字时代的人们对事实持有自信的错误认知。^⑨

总体而言，“空说空转”虽源于语言哲学对言行关系的讨论，但在当代政治传播语境中已扩展为政治逻辑与传播逻辑交互作用下的实践现象。为揭示其结构条件，本文从政治逻辑与传播逻辑两个分析维度加以抽象。前者指向政治权力合法性建构与责任分配的优先程度，后者指向符号流通性与传播调适性的优先程度。两者属于理论上的维度区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交织共存。在此框架下，可形成 2×2 类型结构（表 2）。其中，模糊空说与形式空说的政治逻辑优先度较高，均围绕合法性意义展开，但前者通过语义弹性实现传播调适，而后者以程序合规为动力，传播优化并非其组织重点。施行空说以传播扩散为主要组织原则，通过相对“去政治化”的承诺表达降低政治张力。数据空说则将复杂政治实践简化为技术表征，其合法性表达主要依托数量化绩效证明，而非价值辩护；其传播效果依赖数字所赋予的客观性印象，而非经由语义或情绪的传播调适。不同类型呈现了政治传播中言行断裂的内在逻辑，这不仅仅只是公共言说的修辞偏差，而是权力正当化过程与传播组织原则在不同结构条件影响下形成的政治传播异化结果。

表 2 政治传播中“空说空转”的四种类型

	传播逻辑（高）	传播逻辑（低）
政治逻辑（高）	模糊空说	形式空说
政治逻辑（低）	施行空说	数据空说

讨论：以事实为底线，以本真为方向

尽管本文已呈现了大量对“空说空转”现象的批判性分析，但在文章的结尾，我们希望以一种“理解”而非单纯“批判”的视角作结。从宏观历史视野来看，“空说空转”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它随着后现代色彩的解构精神而来，是现代理性主义在公共传播实践中的深层自我悖反。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逐步取代了神圣叙事与个人魅力，推动了政治传播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具有韦伯式现代理性的双重面向：在工具理性层面，体现为政治传播技术的专业化；在价值

理性层面，则通过政治正确与程序正义实现自我正当化。然而，“空说空转”恰恰是这一理性化进程负面效应的集中呈现。

“空说空转”与民主政治及其媒介体系的发展存在深刻关联：一方面，民主政治与新兴媒介拓展了公共言说的主体，鼓励公民对并不充分知情的公共议题表达意见，客观上滋生了社会中“空说空转”的土壤；^①另一方面，民主与媒介结构却未能同步建立与之匹配的责任制度。政治传播者为适应碎片化的受众结构，使用简化、象征化甚至回避实质的修辞策略。^②政治传播中的言说者、渠道、责任承担者被专业化分离。在保障表达自由的同时，言说责任去中心化，形成可言说却不必负责的传播状态，政治权威亦同步成为一种基于情绪动员的立场展演。

在此背景下，“空说空转”演化为一种面向民主社会的新型政治传播技术。这种工具理性虽然成功，但也因其过度成功而带来了异化：越是合规、正确的表达，越可能言之无物。这揭示了现代政治的深层悖论：政治传播越是标榜理性化与专业化，越可能在形式化的技术包装中滑向操纵与虚伪，进而催生公众的信任危机与“犬儒主义的螺旋”。^③从规范理论视角看，这一困境已经不仅仅是个体道德失范的问题，而是困于现代政治传播体系的制度性症候。诚如哈贝马斯所言，这一“系统”内含公共领域与反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张力，“空说空转”是前者异化为后者的一种表现。更令人沮丧的是，哈贝马斯试图以交往理性化解韦伯式理性困境的设想亦未奏效，进一步暴露出现代理性规范在当代政治传播中的实践困境。

作为一种社会镜像，“空说空转”揭示了当代政治传播的核心困境：真相濒死，或者说，17世纪以来的理性规范正在多元主义叙事中逐渐趋向瓦解。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均难以独立为现代政治传播提供稳固的规范支撑，而交往理性目前仍然遥遥无期。可以说，“空说空转”是当前政治传播的一个标志性转折：它正在从围绕真相展开的竞争，滑向对真相本身的集体冷漠。这一转变构成了当代政治传播中最具时代症候意义的现象之一。这不得不迫使我们思考：在如此时代语境下，政治传播是否依然有可能重建其与真实、责任、意义的有限联结？

重新寻找最低限度的传播规范，可以考虑回归两个更朴素却更根本的起点。第一，以事实(facts)为最低基线。无论真相何其多元化、解构化，可验证的事实仍是公共讨论赖以存在的最后支点。失去事实，政治传播只能沦为纯粹的符号操纵与情绪表演。第二，从真相转向本真(authenticity)。特朗普现象恰恰提醒我们，民众对传统政治传播的失望，部分源于其“非人化”的表演性质。尽管特朗普的言论常背离事实，却因其展现出某种未经修饰的“活人感”，反而契合后现代传播中“存在先于准确”的情感逻辑。这提示我们，“说对”固然重要，但“谁在说”以及“如何以活生生的面孔去说”，正成为政治传播新的认同(identity)来源。

“空说空转”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现象，理应被严肃对待并深入探讨。无论从历史比较还是规范反思的视角，关于政治传播“空说空转”的理论建构远未完成。在真相濒死、理性失范的时代，若要在犬儒主义的幻象中重建政治传播的公共性，唯有以事实为底线，以本真为方向，这或许是政治传播抵御虚无的最后防线。

注释：

① 在政治传播领域，学界用“公共领域被破坏时代的政治传播”“后民主”“后真相”“第四代政治传播”等来描述这一新的现象。参见 W. Lance Bennett and Barbara Pfetsch, “Rethink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Time of

Disrupted Public Spher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68, no. 2, 2018, pp. 243-253.

② 以特朗普为例，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共发布了 26297 条推文，日均 17.9 条，更是创下过一天发布上百条推文的纪录。但是，在这四年时间里，特朗普共发表超过 30573



条虚假或误导性言论。参见 Factbase, “Donald Trump: Social Media Archive,” https://rollcall.com/factbase/topic/twitter/?platform=all&sort=date&sort_order=desc&page=1, 2025-03-01; The Washington Post, “Fact Checker: In Four Years, President Trump Made 30,573 False or Misleading Claims,” 2021-01-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politics/trump-claims-database/>。

③ The New York Times, “Lies? False Claims? When Trump's Statements Aren't True,”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5/reader-center/donald-trump-lies-falsehoods.html>, Jun 25, 2018.

④ 英国学者布莱恩·麦克奈尔 (Brian McNair) 认为特朗普“打破了美国政治传播的所有既定规则”，其胜选及执政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使得“二战以来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所构建的自由民主共识时代，究竟走向终结，抑或只是全球民主化长期趋势中的短暂波动，仍无定论”。参见 Brian McNair,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6th ed.),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xiii-xiv。

⑤⑧ Time, “Donald Trump Is BS, Says Expert in BS,” <https://time.com/4321036/donald-trump-bs/>, May 12, 2016.

⑥ Zeve Sanderson, et al., “Twitter Flagged Donald Trump's Tweets with Election Misinformation: They Continued to Spread Both on and off the Platform,”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isinformation Review*, vol. 2, no. 4, 2021, pp. 1-24.

⑦ Samuel C. Woolley and Philip N. Howard,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Political Parties,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n Social Me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4.

⑨ David Block, *Post-Truth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30-50.

⑩ 该研究最初以论文形式于1986年发表，参见 Harry G. Frankfurt, “On Bullshit,” *Raritan Quarterly Review*, vol.6, no.2, 1986, pp.81-100。2005年出版单行本，参见 Harry G. Frankfurt, *On Bullsh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2008年中译本《论扯淡》出版，参见法兰克福：《论扯淡》，南方朔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本文沿用南方朔译本，将法兰克福提出的“bullshit”译为“扯淡”，一方面是出于尊重译者对关键术语的本土化转译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呼应了《现代汉语词典》对“扯淡”的释义：闲扯、胡扯。二者均指向话语的虚假性与空洞性。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7页。

⑪⑫⑬⑭⑮⑯ 法兰克福：《论扯淡》，南方朔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7页，第57页，第15页，第75页，第78页。

⑰⑱ 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320页，第322页。

⑲ Mónica B. Vieira, “The Nature of Silence and Its Democratic Possibilitie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vol. 18, no. 3, 2019, pp.424-447.

⑳ 参见刘海龙、于瀛：《概念的政治与概念的连接：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与假新闻的概念的重构》，《新闻界》2021年第12期；史安斌、张金牛：《“误讯”与“谬讯”之辨：概念·成因·治理》，《青年记者》2020年第28期。

㉑ Brian McNair,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6th ed.),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11.

㉒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10页。

㉓ 兰德尔·彼特沃克：《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张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51页。

㉔⑳ 案例详情参见 Brian McNair,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6th ed.) , pp.221-223, pp. 161-163。

㉕⑳ Jennifer Saul, *Lying, Misleading, and What Is Said: An Exploration i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in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 p. 94.

㉖ 翟韬：《白、黑、灰：美国宣传战的三色板》，《历史评论》2022年第3期。

㉗ 还有一个相关概念是误导信息 (disinformation)，追溯其词源，其最早起源于军事和外交领域，核心特征包括：国家层面的系统化、组织化行为；信息真实性较低 (但不全然虚假)；具有明确意图，以误导为目的。相关概念的区别参见刘海龙、于瀛：《概念的政治与概念的连接：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与假新闻的概念的重构》，《新闻界》2021年第12期。

㉘ Sarah Buss and Lee Overton, *The Contours of Agency: Essays on Themes from Harry Frankfur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22, p. 343.

㉙ CNN Presidential Town Hall with Kamala Harris (Transcript), <https://transcripts.cnn.com/show/se/date/2024-10-23/segment/01>, Oct 23, 2024.

㉚ Martin Breul, “Lies, Bullshit, or Propaganda?: Hannah Arend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Fight against Post-Truth Politic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Relig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vol. 8, no. 1, 2022, pp. 52-66.

㉛ Catherine J. Ross, “Ministry of Truth? Why Law Can't Stop Prevarications, Bullshit, and Straight-Out Lies in Political Campaigns,” *First Amendment Law Review*, vol. 16,

no. 2, 2017, pp. 367-420.

③① 威伯尔·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③② 荆学民：《新政治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27—29页。

③③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2页。

③④ 王润泽、米湘月：《新闻世界：新闻学元概念和问题的新探索》，《新闻大学》2024年第1期。

③⑤ Adam F. Gibbons, “Bullshit in Politics Pays,” *Episteme*, vol. 21, no. 3, 2024, pp. 1002-1022.

③⑥ Ewan Davies, *Post-Truth: Why We Have Reached Peak Bullshit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London: Little, Brown, 2017.

③⑦ 诺依曼：《政治扯淡与自我的斯多葛故事》，哈德卡斯特尔、赖施：《为什么要扯淡》，王旭凤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5—226页。

③⑧ 案例详情参见奥萨·维克福什：《另类事实：知识及其敌人》，汪思涵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

③⑨ New York Intelligencer, “Kellyanne Conway Is the Real First Lady of Trump’s America,”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17/03/kellyanne-conway-trumps-first-lady.html>.

④⑩ 科恩：《深入扯淡》，哈德卡斯特尔、赖施：《为什么要扯淡》，第122—143页。

④⑪ 《哈里斯CNN市政厅“翻车”？冗长且答非所问引选民失望》，<https://news.qq.com/rain/a/20241024A08Z2X00>，2024年10月24日。

④⑫ 普莱迪：《一个常识的辩护》，哈德卡斯特尔、赖施：《为什么要扯淡》，第20—35页。

④⑬⑭ 肯布罗：《论听其自然》，哈德卡斯特尔、赖施：《为什么要扯淡》，第6页，第2—19页。

④⑮⑯ 理查德森：《扯淡与事后真诚》，哈德卡斯特尔、赖施：《为什么要扯淡》，第91页，第99—100页。

④⑰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④⑱ Erving Goffma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7, pp. 84-85.

④⑳ James W.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pp. 11-28.

⑤⑩ 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页。

⑤⑫ 陈洋洋：《细数那些年特朗普作出的承诺：至今有近一半未实现》，<https://news.cctv.com/2023/07/27/ARTI711d44OolmO36ILVdhEp230727.shtml>，2023年7月27日。

⑤⑬ 李凌燕、梁文华：《也谈语言腐败：定义、范式及语言表征》，《当代修辞学》2017年第6期。

⑤⑭ David L. Swanson and Paolo Mancini, *Politics, Media, and Modern Democracy*,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p. 43.

⑤⑮ 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2页。

⑤⑯ 史泽华：《“特朗普主义”再兴起的政治逻辑及外交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2期。

⑤⑰ 王海洲将“无责漫谈”界定为是一种不承担身份责任的、去中心化的、轻视认同的话语形式。其中“漫谈”对应英文“gossip”，指一种“可评估的非正式交流方式”。参见王海洲：《政治共识的话语藩篱：霸权独白和无责漫谈》，《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本文借鉴这一概念，但在本文的关切中，“无责漫谈”表现为一种“正式交流”但却责任悬置的政治传播现象。

⑤⑱ Michael Power, *The Audit Society: Rituals of Verifi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9.

⑤⑲ 卡尔·伯格斯特龙、杰文·韦斯特：《拆穿数据胡扯：信息驱动世界的生存指南》，胡小锐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前言第5页。

⑥⑩ James H. Kuklinski, et al., “Misinformation and the Currency of Democratic Citizenship,”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2, no. 3, 2000, pp. 790-816.

⑥⑪ 埃文斯：《扯淡王国：论民主的向上弱智化》，哈德卡斯特尔、赖施：《为什么要扯淡》，第196—214页。

⑥⑫ Joseph N. Cappella and Kathleen Hall Jamieson,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0.

编辑 杜运泉